

# 姐夫珍藏的信件

姐夫是一个吃苦耐劳、为人诚实的庄稼人。不幸的是,前年因突发“心脏病”,他刚七十出头就离开了人世。

办完姐夫丧事的第二天,家人们在清理姐夫的遗物时,大姐眼里含着泪对我说:“你姐夫有一个小木盒,在厢房大板柜里藏着呢!小木盒里装着大队、公社和县里发的奖状、证书和纪念章啥的。”我赶忙跑进老厢房,从大板柜里找到了那个小木盒。打开一看,和姐姐说的一样,奖状有十多张、荣誉证书有八九个、纪念章有四五枚,还有一个发黄的信封。封皮上印着一行字——人民解放军某部xxx信箱。我把信纸抽出来一看,原来是一位常年驻防边疆的解放军战士给姐夫的来信。信是这样写的:

“伯伯,我是一位常年守卫在祖国边疆的东北籍战士。当我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您种田不相信党在农村的富民政策,受到‘老天爷’的无情惩罚,夏收的小麦比左邻右舍减产一半以上的消息后,心里忐忑不安。为

了弥补伯伯在生产上的‘遗憾’,今后对党的政策充满信心,来年争取获得好收成,我把平时节省的15元钱给您汇去……”信的末尾没有署名,只有“8月1日”。这封信虽然话不多,但言简意赅,字里行间充满了“军民一家亲”的浓浓深情。

姐夫一辈子是靠“种地吃饭”的庄稼人,而且勤俭持家,只知道埋头过日子。自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后,姐夫耕种的6亩地,年年每亩产量都超过千斤以上,他也因此连续多年被镇、县授予“粮食状元”和“农业先进生产者”。加之姐夫在村里为人实在,乐于助人,左邻右舍和乡亲们有个大事小情、矛盾纠纷,都愿意找姐夫帮忙协调解决。姐夫在村里人缘好,口碑一流,群众威信很高。

然而,那年国庆节前后,正处在收秋种麦的“节骨眼”上,姐夫不知从哪里听到了“小道消息”,说是开春所有承包的土地都要重新调整地块,农村经济政策可能要改章程。他信以为

真,藏了个“心眼”。看见别人家抢购化肥、种子、农药、薄膜等生产资料,姐夫却按兵不动,急得姐姐一连催了他好几次,他才硬着头皮去镇上买回了4袋普通化肥。小麦播种的时候,他象征性地撒了撒,担心“肥水流到外人田”,结果,姐夫家的麦子一出土就发黄,不像别人家的麦苗长得苗全苗壮。夏收时,6亩麦子只打了2400斤,平均每亩才400斤。而家家户户的麦子每亩都收获800斤以上,有的“冒尖户”每亩达到了千斤。

也巧,因为每年夏收我都需要赶回农村老家忙活几天,看到姐夫一家闷闷不乐,我知道姐夫是听信了“小道消息”,上了谣传的当,吃了小气的亏。但我见到他时,并没有嘲讽他、刺激他,而是耐心地向他宣传党在农村的一系列富民政策,土地承包也会延长年限,可以踏踏实实地“安心种粮”。姐夫手托着下巴频频点头,看得出,他很喜欢我实打实地对他宣传开导。

回到市里以后,我仍然备

感忧虑,“小道消息”真是害苦了老实善良的庄稼人啊!于是,我以姐夫为“典型”,连夜给新华社赶写了一篇600多字的新闻小特写——《一个庄稼汉的懊悔》,新华社于1990年7月8日播发了“通稿”,《人民日报》在7月10日的二版刊登了。后来,此稿还被新华社评为优秀新闻作品。记得评委们是这样点评的:此篇小通讯是“小镜头”“大容量”,写的是一个庄稼汉的懊悔,教育的是全国9亿农民。文章短小精悍,语言活泼,有社会感染力。

就是因为这篇小特写,通过国家主流媒体的传播,才有了开头边疆小战士来信的一幕。当时,姐夫还收到了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,基本上都是给他“打气”的,让他安心种田,坚信党的农村政策不会变。

姐夫虽然去世两年多了,但姐姐一直保存着这封战士来信。今年清明节前聊起这封信时,姐姐说:“我不仅怀念你姐夫,还特别思念那位当年寄来15块钱的解放军战士!” 许贵元/文

## 上课脱鞋挨敲打

1974年,我在本村小学读四年级。到了夏天,由于教室里安装不起吊扇,同学们在里面上课特别闷热。我的脚是汗脚,穿着母亲给我做的黑布鞋,闷脚还出汗,让人难受。看到班里有不

少同学脚上穿着塑料凉鞋,凉快又舒适,我心里羡慕极了。想让母亲给我买双凉鞋,母亲说家里缺钱,等到有钱了再买。

一天上午,正在上课,我的脚热得实在难受,便不由自主

地脱了布鞋,感到舒服多了。可是,教室里却有一股脚臭味弥漫开来。老师正手持一根竹棍上课,闻到脚臭味便问道:“是谁脱鞋了?”随后,他顺着气味走过来。这时,我想穿鞋已来不及了,

老师对我说:“谁让你脱鞋了?污染整个教室。”随后,便拿起竹棍朝着我的脚上敲打了一下,并说道:“谁再脱鞋子,也是这样惩罚。”我的脚被老师的竹棍敲得生疼。 李朝云/文



## 图说往事



## 毕业合影

1971年3月,我从驻保定市的某部一营卫生所,主动要求到曲阳县灵山镇野北村的某部执勤点当卫生员。由于我主动吃苦、热情服务,被保送到河北新医大学医疗系学习,1975年9月毕业。图为医疗系四大班15小班的毕业合影,前排右四为本文作者。

白和平/文并供图

## 到小河里摸鱼捉虾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10岁。那年,我随父母从上海卢湾区一间蜗居多年的小阁楼,迁往宝山区的泗塘新村。新村四周无垠的田野、清清的小河、碧绿的草地以及蹦蹦跳跳的蚂蚱等,给我的童年增添了许多乐趣,我与小伙伴们整天嘻嘻哈哈玩得很开心。

一天,楼上的阿荣、阿兴激动地告诉我,他们亲眼看到,有人从新村旁边一条小河里钓起近一尺长的大鲫鱼。

餐桌上难得一见荤腥,大鲫鱼对我们有极大的诱惑力。买不起鱼竿、鱼网,捕鱼办法还是想得出的。我们悄悄地拿起家中的脸盆、水桶,卷起裤腿走下小河。

选择一段水草丰盛的河湾,我们大把捧起河底的淤泥,大块挖下河边带草的土块,筑起两道间隔六七米的堤坝,然后奋力将堤坝内的水一盆盆、一桶桶泼出去。头顶着热辣辣的太阳,亮晶晶的汗珠顺着面颊流下来,星星点点的泥浆溅得浑身上下都是。堤坝内的水越来越少了,隐约看见了小龙

虾和鲫鱼。

谁料乐极生悲。草草筑成的堤坝竟然决了口,河水涌了进来。我和阿荣急忙抓起土块朝缺口堵。阿兴急中生智,抬起大腿插向缺口,牢牢地站在那里。堤坝内的水终于被淘尽。鲫鱼、龙虾、螃蟹、螺蛳、河蚌等,都成为我们的“俘虏”。

当晚的餐桌上,父母望着盆里、桶里久违的水产品,喜出望外。欣喜之余他们一再叮嘱,以后绝不许进河里摸鱼捉虾了。

弹指间过去了一个甲子。当年的那条小河、无垠的田野以及草地上蹦蹦跳跳的蚂蚱,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

陈祖龙/文

## 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